

薛光前編著

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薛光前編著

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二版

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
一冊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

精裝本定價新臺幣一百六十元正
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一百三十元正
五元二角

編著者 薛 光 前

發行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及
發行所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蔣夫人書評代序

編者按：蔣夫人於讀過是書後，對於書中有關中國，尤其是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期間中國的歷史事實所作的陳述印象深刻，並撰寫了一篇書評。

蔣夫人在把她個人的評語寄給薛光前博士時，在附帶的信中說：「我認為這是一本優良的巨著，因為它說明許多決策與事件的原因，也評述戰時我國政府各機關組織的作業情形，這些作業情形很少爲「局外人」所了解，或是常被誤解，這本書更加可貴的是，它提出所有一切重要的爭論，包括各種謠傳，流言與想像在內，並給予同等機會使其得以公之於世。」

蔣夫人親撰書評全文如下，以代序文：

若說一卷有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中華民國的著述就能充分概括這個時期的所有層面，即使不能說是草率，也可算是魯莽。因爲這個時期日本在政治、軍事、社會、文化、工業和經濟方面對中國造成的創傷與破壞無可計數，更有千千萬萬無辜的生命間接或直接因這場野蠻的戰爭而喪失。由於英國強制下的和平自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完全消逝，以及美國的影響力自二次世界大戰後不斷縮小，而這一事實是如此的明顯，以致華盛頓官員對它毫不諱言，因此，很少人了解中國大陸的淪陷對於整個自由世界的未來將

可能產生的影響。

在戰爭期間，我們以及那些對於我們的抗戰努力真正同情或是假同情的人，都傾向於只提到或描述戰爭的英勇事蹟與我國人民遭遇到的精神創傷和劃時代的挑戰。他們應付困難與在危機中求生存的能力，以及在最痛苦、最危險與最悲傷的情況下堅持到底的精神，無疑的是一種在最艱難的環境中也能堅忍卓絕的過人智能。但是在刻劃英勇事蹟時，人性中的弱點會使人們讚嘆與崇拜對整個事情的偏差觀點，而對於有感情、有身心感受的個人的痛苦、紛亂與迷惑，以及在我們的傳統觀念中視為最重要的個人與他的家庭的關係，却視而不見。在日常生活中，這種弱點招致不安全感，道德墮落，痛苦與突然死亡。簡而言之，也就是把一種生活方式連根拔起的反常現象。

對政府來說，它所面臨的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見的狂暴局勢和包藏的惡運。中國歷史上的侵略記載與之比較，較為緩和，因為它們未牽涉到這麼多地區和這麼多人口，在以往的歷史上，總是有避難所和足夠的時間可以逃避暴風「眼」。要逃避具有強烈摧毀性火力和各種有效運輸途徑的猛烈攻勢是困難多了。就任何一方面來說，中國的命運之船是行在方向不明的海上，因為沒有兩種經驗是完全類似的，更不用說中國是在與一個極端有效率與具有侵略性的戰爭機器——當時為四強之一的日本——抗爭。

在喪失所有海港以及大部分海岸線都被封鎖後，中國以過時的裝備與貧乏的支援工業能力作戰。它的苦難不僅因為大部分能夠應付戰爭所需的資源十分缺乏而加深，我們也應記得當時的特殊情況是層出不窮的內戰。軍閥割據，治外法權，外國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以及在此以前滿清統治下的長期腐敗與政治昏瞶之遺毒，只有在國民政府成立後，我們才開始變成一個民族國家，我要強調「變成」這兩個字。

應變能力與智能雖然有幫助，但是在後勤上並不足夠，這促使西方專家預測我們的抗戰將在三個月內結束——被徹底擊敗。我們不僅設法生存下去，而且還在中國戰場上牽制住可能被用來對付美國、英國和蘇俄的一百卅萬日軍。就這一點來說，羅斯福總統和史達林元帥較那些沒有頭腦，小看中國的抗戰努力的人了解得更清楚。

在日本勢力擴張的大風暴與武力的神奇表演當中，珍珠港事件，被過分吹噓為難以攻破的新加坡堡壘的失陷，「威爾斯王子」號與「驅退」號戰艦的相繼沉沒，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群島和密克羅尼西亞大部分地區的相繼失陷，使得同盟國為之震驚而昏亂。在一夜之間，自高自大而好批評的死硬保守派的作風完全改變了。我在此重提上述的背景是爲了使讀者更加注意到專家們在評估他人與自己時可能犯錯的事實。

由薛光前博士編撰的這本書同時具有適切性與重要性。它的適切性在於它對中國人民與政府在那危急的幾年當中所面對的艱難任務，爲現在與未來那些認真的學者們提供了確切、突出而且非常詳盡的看法——這種看法或是被埋沒，或是很少爲西方學者正確道及，其理由爲何，他們自己最明白。它的重要性則在於它的誠實。但是出人意料的，那些曾以偏見的眼光吹毛求疵的人却在不知不覺中對我國的努力與國民政府表示敬意。這是因爲具有敏銳頭腦的人能夠發現矛盾之處，也能領悟字裏行間的真意。除了賣國賊以外，我國人民的愛國心，未曾稍懈的整體努力，毫不妥協的團結意志，以及政府每一階層的領導，這一切都爲抵抗日本的侵略而貢獻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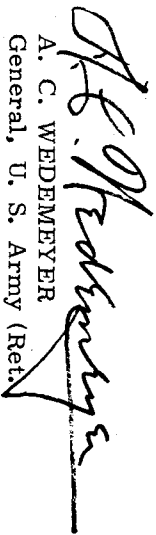
對於參與編撰這本書的中國教授與學者，我的內心只有欽慕。他們根據官方文件的記錄或曾實際參與

計劃和事件的人之記述，而不是只憑臆測和想像，成功的爲這本重要的綜合著述貢獻出他們的所知與了解。因爲他們的所知與了解是根據美國與蘇俄政府個別公佈的消息來源或根據客觀的第三方面的論著。我想這項「原始資料」將可消除任何對於它們的正確性的懷疑。如果還有任何懷疑，必是蓄意的猜測。這些懷疑的論點已被其他人以及梁敬錚教授在他的「補充說明」中（編者按：請參閱本書第四三三頁至第四三九頁，其中詳述蔣經國先生參加會議實際情形，多爲外界所未盡知。梁教授提供大溪資料，證明實情。）予以有效而充分的駁斥。因此我將不在這些問題上多費筆墨。由於所有無聊的閒言與過分熱心的猜測已被平息，我們這一方面將不寬恕短暫的流言，嘲弄與謠傳，它們在面對鐵的事實時，毫不值得學者重視。

蔣宗義於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來函代序

「大著一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早經拜收。遲未即覆，實欲於執筆之前，決定細讀一遍。我向你和各章的作者道賀，并希望是書能普遍暢銷。以此書一定值得學者和史學家的考量。我對這本書的最重要的反應是：你和其他學者或向這本書的供稿人非常客觀而徹底的駁斥過去幾年來，尤其從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有關中國的書籍中所呈現的曲解，誤傳、誤報與誤解。至少就我自己觀察和經驗所得，你的書提供了事實。我在東方十年，其中四年在中國，我和政府各級官員，藝術、科學和政治的領袖，都曾有接觸，所以我自知有資格很肯定的說：我對你這部書的出版，感覺到深深的感激。順頌康健和快樂。


A. C. WEDEMEYER
General, U. S. Army (Ret.)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歷史教授韋慕庭博士評語代序

這本書重要的一點是，大部分撰稿人都是中國歷史學家。他們以「局內人」的身分，討論中國在那段困難的時期內遭遇到的許多問題，以及中國的某些成就。因此，這本書的目的，是在矯正西方作者——「局外人」經常作不利的報導和分析。



C. Martin Wilbur
George Sanson Professor
Emeritus of History

序 言

薛光前

余於一九六九年七月在美國聖若望大學主持「近代中國建國（一九二七—一九三七）研討會」，會後並於民國六十年以中英文編著「艱苦建國的十年」一書，將國民政府自民國十六年在南京開府至二十六年七七對日抗戰時為止的十年期間，在當年蔣委員長領導之下，致力建設，安內攘外，鞏固國防等實績，作有系統的詳細記述。並指出有此十年的艱苦成就，方能從事八年的浴血抗戰，獲得最後的輝煌勝利。此書出版後，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當應哈佛大學之請，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在該校東亞研究所主持之「中華民國問題研討會」上，根據是書要題，作專題演講，並答覆問題，頗獲深切同情。一九七六年四月由聖若望大學與伊利諾大學合作主辦「戰時中國（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研討會」（按：此一討論會為接續「艱苦建國的十年」而舉行，使美國人士瞭解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戰前與抗戰中所做的各項努力。）約請中美學者專家二十二人，將對日抗戰中中國國民政府在軍事、政治、經濟、財政、教育、交通、國際關係各方面的措施與作業，予以公正與客觀的檢討。全部論文及評述紀錄，由余彙編成書，都四百餘頁，由紐約展出書局（Exposition Press）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在美出版，茲將此書英文自序，逐譯如左。

一、參加研討會之主講員與評述員（以姓氏英文字母排列爲次序）

- | | |
|-----|--|
| 陳興家 | Dennis Chinn, Stanford University |
| 易勞逸 | Lloyd E. Eastma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兼任協調員) |
| 侯繼明 | Chi-ming Hou, Colgate University |
| 謝覺民 | Chiao-min Hsie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 入江昭 | Akira Iriy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 易社經 | John Israel, University of Virginia |
| 賴文 | Steven Levine, Columbia University |
| 李雲漢 | Li Yun-han, Historica Sinica |
| 梁敬鎔 | Chin-tung Liang, Academia Sinica |
| 凌鴻勛 | Hung-hsun Ling, Academia Sinica |
| 羅滋 | Jessie G. Lutz, Douglass College, Rutgers University |
| 毛春帆 | Chun-fan Mao, New York University |
| 吳俊升 | Ou Tsium-chen, 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Hong Kong |
| 浦薛鳳 | Dison H. F. Poe, St. John's University |

夏倫 Peter Schra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沈宗瀚 T sung-han Shen, JCCR, Republic of China
徐乃力 Lawrence Shyu,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Canada
薛光前 Paul K. T. Sih, St. John's University (兼任協調員)
唐宗明 Anthony Tang, Vanderbilt University
董霖 William L. Tung, Queens College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費德生 William W. Whitson, Congressional Record Service, Library of Congress
吳相湘 Hsiang-hsiang Wu, College of Chinese Culture, Taipei

二、「戰時中國研討會」的主旨、組織及經過

美國故總統甘迺迪曾說：「人生是不公平的」(註一)這就一國的政治史來說，尤為確切。歷史的判斷，全在史家所持的觀點。蘇東坡曾有詩句：「橫看成嶺側成峯」。除非是人能把世局的整體，作適當深度的透視，無法提供公平正確的史實。換言之，我們必須要把現實來對照理想，把理想來反映現實。因此，如何使理想的憧憬，和現實的事物，互為印證，洵為歷史研究最重要的課題。

一般說來，凡是身歷其境的人，因之可稱為「局內人」，往往著重事實經驗，而缺少理想假設。凡是沒有參與其事的人，因之可稱為「局外人」，往往著重假想，而忽略事實的一面。

當今研究歷史者的任務，一如以往史家的所爲，要在可能達成的現實，和假定設想的瞻範兩者之間，採取折衷至當之道。我們固不能對任何政治設施的缺失，故意掩蓋，秘而不宣，但同樣的，我們也不能不顧基本的事實，吹毛求疵，把理想——不論如何高貴，和現實混爲一談。

本此執中厥當的主旨，自一九七四年四月三十日至五月二日，在紐約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和伊利諾大學亞洲研究所聯合主持之下，假伊利諾大學舉辦了「戰時中國——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的研討會。承伊大歷史系易勞逸博士的通力合作，使這三天的會議，達成了圓滿的結果，此本書「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之所由來也。

爲使會議能儘量達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平衡研討，會議的組成份子，包括了「局內人」和「局外人」。「局內人」根據本人體會的經驗，抒其所見；「局外人」本乎學術研究的精神，貢其所得。「局內人」並非所見皆是，「局外人」也盡非徒托空言。雙方觀點，容有出入，但彼此開誠佈公，切磋琢磨。溫故知新，互多裨益。

會議組織之始，爲簡化名稱起見，稱爲「戰時中國研討會——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事實上會議主要目的，在檢討八年對日抗戰中，中國國民政府所作的努力和成就。換言之，凡涉及中共控制地區的戰時行爲，並不包括在內。此項原則，除了兩位評述員外，所有的主講員和評述員，都一律適從辦理。這兩位評述員，一位是羅格斯大學的羅滋教授，關於戰時教育的評述。另一位是伊利諾大學的夏倫教授，關於戰時經財的評述。這兩位都涉及中共的措施，但以限於會議原定的計劃，故在會中，未予充分的討論。

三、研究歷史的兩大重點

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會議開始，我以會議協調員的身份，向與會人員致開幕詞如下：

「湯恩培於史學研究中，論及處理一國的歷史，指出兩大重點：第一，沒有一個國家的歷史，能由國內一切事物的變化，來說明一切。歷史的造成，不是單獨由於國內的力量，而是由於更廣泛的因素，特別是外在的關係。第二，由於這種廣泛因素所形成的單獨事件，一定要在全體的、綜合的、統盤的衡量下，才能瞭解這些單獨事件的演變和意義。」

這位英國著名的歷史家又指出：在任何歷史研究中，要瞭解某一特定人物，在某一特定事件中所表現的行爲，一定要把他對手方的行爲和反應，以及在行爲時所處的全面環境和綜體情況，鑑衡至當，否則無法得其要領。

我們討論抗戰時期的中國（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就要本此精神，有此認識。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即受外來列強的壓迫。研究中國歷史，如不體認這點，就無法知其蘊底。不平等條約使列強損害了中國在政治、經濟、司法各方面的主權。這不平等條約直到第二次大戰後期，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由英美與中華民國締結新約後，方告完全取銷。

在中國的國際關係上，日本、蘇聯、英國是三大剋星。這三強侵略中國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欲損害中國，攫取特權的目的，則并無異旨。

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日本爲中國的對敵，明槍交戰，壁壘分明。蘇聯的情形不同。蘇聯明爲中國的朋友，事實上祇是利用中國抗日，來防禦其東方的敵手——日本。同時趁機扶植中共，赤化中國。佯結爲友。實爲內敵。但自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蘇聯和日本簽訂中立協定以後，中蘇關係，破綻立顯。所以一九四一年是關鍵性的一年。

一九四一年一月，中共公開反抗中央，新四軍在蘇北作亂，叛跡顯然，同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珍珠港。蘇聯認爲日本的命運，已經註定，必爲美國擊敗。因之，蘇聯不必再依靠蔣委員長所領導的「舊中國」，而全力支持以毛澤東爲首的「新中國」。蘇聯所企求的，不是統一的中華民國，而是赤化的蘇維埃中國。日本進襲珍珠港以後，英美與中國結爲盟邦。英國在遠東作戰，目的爲保持固有帝國主義的利益，英國迄今仍保有香港。美國對遠東並無殖民地主義的野心，但以美英傳統歷史關係，尤以所持的遠東政策，往往鼓桴相應，所以中國對美國也無法完全放心。加以戰時民族主義的高潮澎湃，沒有一個國家爲保衛獨立自由、而對外作戰時，能容忍另一外力的壓迫或干涉！

我們一刻不可忘記：抗戰時南京有一以汪精衛爲首的偽政權。中央政府爲消滅這偽政權，自身一定要保持獨立自主的立場和國格。有一次，周恩來親口對季辛吉說：「蔣介石先生具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毛澤東對日本的一個政客訪問團也說到：「蔣先生是一位愛國者。」這種由蔣總統在戰時領導全民，發揚蹈厲、自尊自主的精神，在我們研究戰時中美關係時，特別在檢討史迪威事件，和馬歇爾使華調解國共問題時，必須牢記在心，不可或忘。

在國際間打交道時，欲把盟國的「友誼勸告」和「政治干涉」，劃分清楚，十分爲難。自美國參議院

調查委員會公佈了中央情報局在海外的一切秘密活動後，我們殊覺觸目驚心，回想美國於戰時在中國的所作所爲，不能一概認爲心地純善，一無他意。

研究歷史的第二個重點，就是在研究個體時，必須體驗全體局勢和發展。我們不能見樹不見林，我們以手指指望月亮，眼光應集中在月亮，而不能集中在手指。如祇望手指，而不望月亮，不但見不了月亮，連自己的手指，也覺茫然迷目了！

這個比喻，可適用於我們討論抗戰時期的中國。戰時中國最先關切的，是軍事第一，勝利爲先。除此之外，都爲次要。以軍力和物力言，中國實非日本之對手。祇是因爲中國有堅苦卓絕的賢明領袖，用能領導全國，萬衆一心，抵抗到底，獲致勝利。但在作戰時，任何政府，難以討好人民。征兵要求人民的生命，征糧要奪人民的生計，怎能博得萬家歡心！

這種瞭解戰時全般情況的前題，在討論每一特定問題，或某一特定人物時，必須先有體會。因爲歷史事實，只有在全面局勢的範疇中，才能顯出其意義，也只有具體敘述的事實中，才能體驗歷史的真諦。一九三七至四五年的戰時中國，其最要目的，是不屈不撓，與盟邦并肩作戰到底，決不中途妥協。在這八年之中，中國艱苦備至，危險百出。但政府立場，堅定如一，貫徹始終。我們知道堅強的領導，爲政府抵抗外侮唯一的先決條件。政府戰時措施，無法盡如人意。但爲贏得勝利，一切疵瑕，當難苛責！

我們知道戰時欲實行民主，實非其時。譬如組織聯合政府，無論結果如何，勢必減削戰時中國政府所必需的堅強領導中心。當一所房屋著火時，最要緊的，如何撲滅火燄，決不容許大家商量，議論盈庭，勸告救火的首腦如何掌握或讓大家分撐水管，或討論這滅火機，是否該上些機油！

談到中國大陸的淪失，這是另一問題，非本討論會所及。似宜另開一會，專事檢討自一九四五至四九年的切演變。

歷史是連貫的，無法一刀兩斷。但為瞭解其中變化過程，不妨分列時期，予以斷代處理。

一九三七至四五年，是中國抗戰時期。一九四五至四九年，是中國復員時期。中國抗戰勝利，是一九三七至四五年的獨特表現，也是中華民國的輝煌成功。一九四五至四九年，中國復員戡亂工作，未能悉如人意，導致失敗，咎有攸歸。但於此，我們不能不記住湯恩培的所說：一國的歷史，不能自免於外力的影響，同時研究某一事件，不能不聯想到其他有連串的事件，互為依伏，相為表裏。研究一個人的行為，不可不同時研究對手方的行為和反應。真理不能在某一單獨個體中存在，一定要在全體綜合的局勢中，通盤觀察，方能得其全般真相。

祇有在個體研究和全般瞭解的深度檢討和衡量中，我們才能體驗一切變化的真相，才能為歷史作一公正的交代！」

四、戰爭的起源：七七蘆溝橋事變的背景

第一篇論文是中華民國國史館李雲漢教授提供的「戰爭的起源：七七蘆溝橋事變的背景」。依評述員芝加哥大學教授入江昭博士的評斷：「李先生很精巧的把遠至二十年代一些背景性的事實引述出來，并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前的各種事件與變故，編織入中日衝突的簡明歷史之中。」入江昭